



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编著

西北历史研究

一九八六年号



三 秦 出 版 社

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著

西北历史研究

三 秦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西安

西北历史研究

一九八六年号

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编著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•

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8.375印张 2插页 206千字

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西安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

书号：11388·022

定价：1.90元

前 言

为了工作的需要，西北大学的部分同志从一九七三年起，就集中力量，努力从事于西北史地的研究。研究的范围，包括民族关系、中俄关系、历史地理等三项互相联系的内容。筚路蓝缕，创始维艰，奋斗不息，已十余年。一九七九年起，在完成《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》一书以后，更以研究集体（西北历史研究室）的形式，取分工合作的方法，在修远的道路上，上下求索，又取得了一些成绩。除以各种专著和论文公开刊布以外，并内部出刊《西北历史资料》一至十二期及增刊一期（1980至1985年），久承有关专家和爱好者垂青。惜印数太少，且未能广征精选，深感遗憾。经多方努力，从一九八六年起，《西北历史资料》改版为《西北历史研究》，由三秦出版社出版。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切望国由外贤达不吝赐教，促其前进。

自汉唐以来，西北的民族关系与中外交往建树卓著，影响深远；自清乾嘉以来，异军崛起，遐迹闻名的“西北史地之学”贡献很大。在当前社会“两个文明”的建设中，在“开发大西北”的宏图中，如何在“西北史地之学”的研究方面溯源汇流，承先启后，发扬光大，多做贡献，有赖于全国有志之士，共同努力。切望该作的出版发行，能为推进“西北史地之学”的研究，开发大西北的事业贡献力量。

郭绳武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

目 录

前言.....	郭 绳 武 (1)
西戎八国考述.....	王 宗 维 (1)
丁零的南迁及其同匈奴鲜卑的融合问题	段 连 勤 (56)
论十六国时期的“胡汉分治”.....	周 伟 洲 (87)
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矛盾的性格.....	胡 戟 (109)
论构成民族特证的民族语言.....	刘 伯 璠 (126)
左宗棠与“清流”派.....	赵 春 晨 (155)
阿古柏入侵期间英国对我国新疆的侵略.....	董 志 勇 (168)
陕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.....	李 健 超 (188)
明末陕西科学家王徽著译考.....	李 之 勤 (213)
附录：《西北历史资料》1980年至1985年目录	(254)

西戎八国考述

王宗维

前 言

“西戎”一词，西周时开始使用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有“织皮、昆仑、析支、渠搜，西戎即叙”一语。但顾颉刚先生认为《尚书》是后人汇编的，其中《禹贡》成书较晚，当春秋战国时期。还有人说，“它决不是夏、商二代所写定，甚至也不是西周的作品”，它的“制作时代，应在春秋至战国前期的时间范围内”。又说“虽被后人写的夸张、铺陈，但在其主要内容上，是有某些历史素材作依据的”^①。据此，上述织皮、昆仑、析支、渠搜等族名可能源于商代以前的传说，而“西戎”一词，则是后人附加上去的。

在《竹书纪年》中也有商王祖甲“征西戎”，大戊二十六年“西戎来宾”等语。如所共知，这部书成书的时间更晚，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写的大事记，前代部分是追述的。虽然其中有许多史实有根据，可以作为史料引证，但行文中夹有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词语，“西戎”即是一例。因此，我们更不能以此断定“西戎”一词商代已经采用。

西周建立前后，周人称他们的四邻为“西土”、“西土之

人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：武王至商郊牧野，乃誓，曰“远（《尚书·牧誓》作‘逖’）矣！西土之人”，“我有国家君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亚旅、师氏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鬻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；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，予其誓！”下文还有“以役西土”一语。这段话显然是周武王的口吻，可见，西周初期，以“西土”、“西土之人”称周的邻邦，是常用的词句②。

上述“西土之人”中所包括的庸、蜀、羌、鬻、微、卢、彭、濮，《史记集解》引孔安国曰：“八国皆蛮夷戎狄。羌在西。蜀，叟。鬻、微在巴蜀。卢、彭在西北。庸、濮在江汉之南。”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房州竹山县及金州，古庸国。益州及巴、利等州，皆古蜀国。陇右岷、洮、丛等州以西，羌也。姚府以南，古鬻国之地。戎府之南，古微、卢、彭三国之地。濮在楚西南。”根据这两种解释，《集解》所说在西者，仅羌、卢、彭，《正义》所说在西者，仅羌一族，实与周初情况不符。

徐中舒先生曾发表《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》一文，提出新的看法。顾颉刚《史林杂识初编·牧誓八国》充分肯定了徐氏的成果，并加以发展：庸在汉水流域；濮在今湖北武当、荆、巫诸山中；微通“眉”，正可实用于陕西之郿县；卢与微相近，当距此不远；鬻、茅同声，疑即一族，在今山西南端；蜀即叟，在四川；羌在西。要之，庸、卢、彭、濮，“此四国与蜀均在汉水流域，羌、微、茅在渭水及河水流域。故如以秦岭与汉水为界，则此八国者，三在北而五在南。”

顾氏此说，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。前人考释，多根据秦汉、甚至隋唐时期的地名解释此八族的位置，因而得出那样的结论，以为八族在汉水、岷江、金沙江流域，甚至还在今云南地区，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四川境内。从地名学的角度说不无道理，但从实

际情况分析，则有问题。当武王伐纣时，周的势力并不太大，而今四川省地方与殷商并无隶属关系，因而周族不可能越过秦岭、巴山深入岷江、大渡河以及金沙江以南联合此八族之人，共同伐纣。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，也有很大困难。此八族与有关地名的关系，只能作这样的解释：周灭商以后，随着周族向全国各地的发展，这些民族也逐渐向各地迁移。这种迁移，历史很久。许多学者公认，今四川彝族，云南的普米、哈尼、纳西等族是古羌的分支，由河湟地区迁居到那里。但是，根据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记载，诸羌东南迁徙的时间较晚，在战国时期，“秦献公（前384—362）初立，欲复穆公之迹，兵临渭首，灭狄、獯戎。忍季父印畏秦之威，将其种人附落而南，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。……其后子孙分别，各自为种，任随所之。或为牦牛种，越嶲羌是也；或为白马种，广汉羌是也；或为参狼种，武都羌是也。”即便说这种迁徙不始于战国，而在周代、甚至商代就有，这仅能说明迁徙的过程很长，而不能否认该族由西北向东南迁徙的事实。因此，秦汉以来，四川、湖北、云南等地存在的与此八族同音的地名，只能从民族迁徙史的角度考虑，而不能得出结论说，当时参加武王伐纣的八族，分布在陕、甘、川、鄂、滇五省之地。就以蜀为例，蜀即叟，据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武都郡、阴平郡条记，武都、阴平地方，不仅西汉时氐、叟、羌杂居，东汉至三国时，其地仍“多氐叟”，“风俗所出，与武都略同”。因此，参加伐纣的蜀，不在今四川，实际就在甘肃东部。同样，其它各部，羌与姜同族，与周为邻，不必远在羌中寻求，掣不是顾先生所说的晋南的茅，实就是苗。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窜三苗于三危”。顾氏《瓜州》篇考证，此三危所在，即《河图括地象》所说，“在鸟鼠山之西南，与汶（岷）山相接”。即今甘肃洮河上游。既然有舜迁三苗于三危之传说，三危山就在今甘肃东南部，苗与羌杂处；因而就有同羌参加伐纣的条件，所以此苗就是伐纣八族

中的鬲。顾氏考证微通眉，即陕西郿县，在周原之南，由此我们想到渭北有彭衙（今陕西白水县），郑（陕西华县）东有彭戏氏、此八族中的彭当时就在关中地区，楚西北的彭（今湖北房县）当是后来迁去的。同样，今湖北竹溪汉水南岸的庸，也和彭相似，或是从关中西部经汉水东迁的。这样，除卢还有待考证外，其余七族，蜀、羌、鬲在甘肃东南部，微（眉）在陕西关中，彭原在关中，濮、庸原在汉水上游。这样，武王伐纣时联合的八族，基本上就在周原附近几百里的地方。几百里内的许多民族参与伐纣的战争，事实上才是可能的。

“西土”和“西土之人”是以哪里为中心划分的呢？当然是以殷都安阳为中心，而不是以周为中心。从甲骨文得知，商代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的概念已经形成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，周族自古公亶父迁于岐下，至文王昌立，殷封其为“西伯”，岐下正在殷的西方。因为周族居地在殷的西部，所以周人也自称或称其邻部为“西土”、“西土之人”。就大方位讲，关中地区、汉水上游、甘肃东南部都在殷之西。如果把八族中的大部分定在湖北西北，四川南部，就和这个地理概念不相符合了。

其次再说戎。

“戎”字见于甲骨文，说明商代已有。但作为族名所指，目前还搞不清楚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有“古公乃贬戎狄之俗”、“明年，伐犬戎”等记载。不过这是汉代司马迁所记，不见得周初就有此称。同样，《竹书纪年》有殷王伐西落鬼戎、燕京之戎、余无之戎等记载，但这本书为战国时作品，也不能证明殷周之际有这么多以戎相称的民族。周人对于戎的称呼，还是要从“伐犬戎”之事研究起。

《诗经》是周的民间文学集，其中《绵》篇云：“混夷駸矣，维其喙矣！”《说文》口部引此句时，将“混夷”作“犬

夷”。《尚书·大传》又记“文王……四年伐吠夷”，《西伯勸黎》《正义》引作“犬夷”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“周西伯昌伐吠夷氏”句下注：《索隐》引韦昭云：“春秋以为犬戎”。案，吠音犬。大颜云：“即昆夷也。”《山海经》云：“黄帝生苗龙，苗龙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二牡，是谓犬戎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赤狄木犬种，字从犬。”

王国维《鬼方昆夷玁狁考》，对纒夷与犬戎的关系作过考证，云：“混之为昆、为纒、为吠、为犬，古喉牙同音也”，“昆夷、薰育、玁狁，自系一语之变，亦即一族之称。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。”而“《孟子》言‘太王事獯鬻，文王事昆夷’，……乃由行文避复之故。”《诗·绵》所记，当“太王定都后，伐木开道，混夷畏其强而惊走也”。王氏的论点，说明纒夷、混夷，昆夷、畸夷、吠夷、荤粥、獯鬻等是同族异写。至于纒夷与戎的关系，他引《出车》诗云：“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”，“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”，以为玁狁和西戎、昆夷，可以互相代替。而《出车》为宣王时作品，可见“西戎”一词周初尚无此称，当然也无“犬戎”、“吠戎”之说。

韦昭云：“春秋以为犬戎”。黄文弼《论匈奴族之起源》一文说：“犬戎之名，始见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，皆春秋战国以后中原呼昆戎之称。宣王以后，因犬戎为患最烈，故后世追记，悉加以恶名，昆夷变为犬戎……皆平王东迁后事也。”

上述可见，纒夷即昆夷，亦即犬夷、吠夷。纒夷、犬夷变为犬戎，是在周宣王以后开始的。韦昭以为始于春秋，而《出车》已有“西戎”之说，可见西周末年西戎一词已开始使用，接着出现犬戎，因为犬戎是西戎中最大部落之一。犬戎一词见于史册，大致在春秋时代。

纒夷和犬戎的涵义，也有不同说法。愚以为纒夷是本族名

称，由汉文写为緄夷、昆夷、葷粥等，它是商代由东向西迁来的一族。犬夷是该族以犬为图腾而得名。《山海经》、《说文》的解释不妥，但也反映出该族崇拜犬的意思。王国维说是“为緄、为吠、为犬，古喉牙同音也”，则未必妥当。至于黄文弼所说“宣王以后，因犬戎为患最烈，故后世追记，悉加以恶名”，则更不妥。戎字甲骨文从戈，带武力之意。西周末出现的西戎，包括许多部落，犬戎仅是其一。如果说因相互战争产生敌对情绪，因而对其名称带有贬意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说它是恶名，则不妥当。春秋时，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已成为与中原华夏族对称的名词，而夷原是东方族名，狄是北方突厥语系一部分民族的名称，原来就是自称，并非恶名。因此，如果仅仅把西戎的“戎”作为恶名，是不妥当的。

最后，再说“八戎”、“西戎八国”。

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：

赵良曰：‘夫五羖大夫，荆之鄙人也。……相秦六七年，而东伐郑，三置晋国之君，一救荆国之祸。发教封内，而巴人致贡，施德诸侯，而八戎来服。由余闻之，款关请见。

五羖大夫，即百里奚，其相秦时间，始于秦缪公五年（前655）。三十四年（前626）戎王使由余观秦，时百里奚仍在，则此服秦之“八戎”，时间当在由余使秦前数年。由此可见，“八戎”之说，最晚在缪公三十年（前630）已经出现。这时正是春秋时期，说明春秋时秦国已有八戎之说。

但是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记：秦缪公三十七年（前623），秦“用由余谋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”。而赵良所说五羖大夫仅仅是“施德诸侯，而八戎来服”，由余献计于秦，并十二国，此十二国中当然包括“八戎”，但“八戎”指什么，十二国又指什么，尚无法考证清楚。

“八戎”和“十二国”，不包括邾、冀之戎。据《秦本纪》记：

秦武公十年（前688），秦伐“邽、冀之戎，初县之”。可见，邽、冀之戎并入秦在前，与五羖大夫时归服的“八戎”和由余时所并的十二国之戎无关。

“八戎”和“十二国”之说，司马迁在《匈奴列传》中，又变成“西戎八国”：

秦穆公得由余，西戎八国服于秦，故自陇以西有绵诸、緄戎、翟、獯之戎，岐、梁山、泾、漆之北有义渠、大荔、乌氏、朐衍之戎。……各分散居溪谷，自有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，然莫能相一。

此“西戎八国”与前述之十二国大致是一事，“西戎八国”说的来源，是“八戎”说。
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的作者叙述此事时，既不提“八戎”，也不提“十二国”，只是笼统的罗列出来，云：“及平王之末，周逐陵迟，戎逼诸夏，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，往往有戎。于是，渭首有狄、獯、邽、冀之戎，泾北有义渠之戎，洛川有大荔之戎，渭南有骰戎……。”除骰戎（在秦之东，不在西戎之列）和邽、冀之戎（在秦穆公以前已并入秦国）外，合乎西戎八国者，仅狄、獯、义渠、大荔四戎而已。

《资治通鉴·秦纪》完全采用了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的说法，列举西戎八国为绵诸，緄戎，翟戎，獯戎，义渠之戎，大荔之戎，乌氏之戎，朐衍之戎。因此，我们考述的“西戎八国”，就以此为依据。

一、绵诸戎

春秋时的西戎八国和周初的西土八族有些关系，但内容不同。第一，西周初的西土，是以商为中心划分的，参加灭商的八族，大都在周族的周围；而春秋时的西戎八国，是以东周都城洛

阳为中心，八国在宗周和秦之西。第二，西周初的八族，有的在西周时已经向其它方向迁移，而春秋时的西戎八国有的是从别处迁来，有的当时虽在西方，但未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，所以两者所指的地区不同，内容也不一样。

西戎八国自陇山以南，首述绵诸之戎。

陇山，即今陕西陇县、宝鸡以西，甘肃清水、张家川以东陕甘两省分界之界山。绵诸就在陇山之西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惠帝三年（前192），陨石于绵诸。《地理志》：天水郡有绵诸道。《百官表》：县“有主蛮夷曰道”。汉天水郡原属秦陇西郡，元鼎三年（前114）分置，《地理志》称绵诸为道，不称县，可见绵诸戎的部落、氏族组织，西汉时依然存在。

绵诸的方位，据《水经注·渭水》条记载：“清水又西南，得绵诸水口。其道源西北诸溪，东南与长思水（合），北出思溪，南入绵诸水。又东南，历绵诸故道北，东南入清水。清水东南注渭。”清水，即今甘肃清水县得名之水。水出其东北之陇山，百川汇集，形成大河。绵诸水在清水下游汇入，位置应在今清水县西南。清水入渭处在今天水县东莫家寺，则绵诸应在其北。绵诸水因绵诸道而得名，绵诸道又因绵诸戎所居而得名，所以，绵诸之戎的居地，应在今天水县东、清水县南部地区。

又《魏书·地形志》秦州略阳郡条下绵诸县本注云：“前汉属天水，后汉、晋罢，后复属。有榆亭。”《校勘记》据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，认为此榆亭为桥亭之误。《水经注·渭水》又记：“渭水又历桥亭南，而入绵诸县东，与东亭水合，亦谓之桥水也。清水又或为通称矣。”桥亭在上邽故城东，渭水历桥亭而入绵诸县东，则绵诸范围当跨渭水两岸，西与上邽县接。由此又可知，绵诸之戎的分布地区不仅在渭水以北的清水河下游地区，天水东部渭水以南地区也有绵诸戎分布。

到了唐代，绵诸故城犹存。《括地志辑校》秦州秦岭县条下

记：“绵诸城在秦岭县北五十六里。”秦岭县，据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，在“清水县西南百三十里”，“唐贞观十七年并入清水县”。由此亦可证绵诸之戎的居地在今清水县西南及其南部。

绵诸之戎的分布在清水西南，而清水是秦人早期开辟的地方（周宣王时，秦的势力开始越过陇山向西发展、进入甘肃清水地区），一段时间曾是秦人的主要据点，所以绵诸自然是秦人扩张的对象。

秦与绵诸之戎的关系，历时达六百年。周宣王命秦仲伐西戎，在前823年左右。秦仲战死（前821），宣王又命庄公伐西戎，此西戎之中应包括绵诸戎。后来，由于犬戎攻周，庄公、襄公伐戎救周，此时秦的兵力主要向东，对绵诸之戎不会造成严重威胁。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秦文公四年（前762）秦“至汧、渭之会，曰：‘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，后卒获为诸侯。’乃卜居之，占曰吉，即营邑之。”这说明在文公以前秦虽有西垂宫，在西垂有一定的势力，但仍无定居的都邑。营邑汧渭之会，才把政治中心确定下来。此地原是秦人祖先非子（周孝王时）牧马之所在。

秦武公十年（前688），秦人向清水西南发展，“伐邽、冀戎”^③。邽，汉代属天水郡（今天水市）；冀为冀县，在上邽西。此二戎与清水连接，遂成为秦向西扩张的重要对象。绵诸之戎处于秦伐邽、冀之戎的当道，而史书不载秦与绵诸戎交战的情况，大概绵诸戎在秦的压力下，将部落徙居深山，没有阻挡秦的西征。

秦穆公时有两次大规模的伐戎活动，一次是五羖大夫相秦时“八戎来服”，一次是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，“益国十二”，时间在穆公晚年（前630—623），此八戎和十二国中当包括绵诸之戎。

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记载了后来秦与绵诸之戎的接触过程。秦厉共公六年（前471），“绵诸乞援”，二十年（前457）“公

将师与绵诸战”；惠公五年（前395），秦“伐绵诸”。

根据上述，绵诸之戎在春秋时已臣服了秦国，战国初年向秦乞援，以后和秦国不断发生矛盾。秦国灭邽、冀之戎以后二百多年，绵诸戎仍然顽强抵抗秦的吞并，说明此族势力相当强大。自惠公五年以后史书再不见秦伐绵诸的战争，大概这一年就是秦统一绵诸的年代。秦孝公用商鞅变法，加强对各地的统治，绵诸戎从此处于秦的直接统治之下。秦昭襄王设立陇西郡，后于绵诸戎居地置绵诸道，属之，从此行政管辖统一，部落组织犹存。

二、緄夷（戎）

緄夷即猷夷，是犬戎的一部，又作獯鬻、葷育，是緄（昆、浑）夷的同名异译。

犬族的活动，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，其首领被封为犬侯。卜辞记：

令犬豨于京（《续》6.7.9）

令多子族比犬侯宝（又释作“寇”、“璞”、“聘”等）

周，叶王事（《续》5.2.2）

令多子族众犬侯宝周叶王事（《前》5.7.7）

欲说明“犬”在商代的居地，首先要明确周的居地。钱穆《周初地理考》，曾提出周族起于山西汾水流域及吕梁山一带的观点，齐思和《西周地理考》持反对意见④。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根据大盂考古资料结合地名、传说等研究，证明周族原居于晋南汾水流域，所谓“居幽”的幽，实即汾水的汾，传说中周族早期的活动地，在今晋南地区都可找到遗迹。持这种说法的有陈梦家（见《殷墟卜辞综述》）、邹衡（见《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》）等。周族早期的活动地区既定在汾水中下游，那么，“宝周”的犬侯必然在其附近。罗琨《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》⑤认为多方是指商王

国西北境外游牧诸族的部落及其联盟，多子族指其中的许多小部落，山西石楼义牒铜觚有铭文“子”，说明此地与商代多子族人有关。结合周围地区出土的同一类型文物分析，可能犬族也在晋西北、陕北地区。又陈梦家云：“犬和缶（晋南）、雀（豫西）、纣、亘（垣曲）等国有交涉，它可能是周人所谓的畎夷、昆夷、犬戎。……《左传》僖十六年‘狄侵晋……涉汾及昆都’，今临汾县南有昆都聚，可能是昆夷之都。”^⑥可见当周族在商之西方山西汾水流域居住时，其西、西北有多子族犬族分布，缁夷和他们关系密切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“后桀之乱，畎夷入居邠、岐之间，成汤既兴，伐而攘之”中的邠，也应是汾水。岐的位置，据宋人蔡沈《书集传》说，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，王应麟《困学记闻》地理篇从之。这样，畎夷、昆夷当居住在汾水流域和其西部，与殷虚甲骨的记载基本吻合。

商武丁时发生过多伐羌及多子族方的战争，迫使其西迁北移，缁夷或在此时或以后陆续西迁，部分到达关中西部。当古公亶父逾梁山（今陕西韩城东及吕梁山地区）至于岐下（今陕西岐山）时，缁夷已在此有较强大的势力。所以《孟子》“太王事獯鬻，文王事昆夷”的传说，正反映了周族弱于缁夷的状况。从周文王开始，不断削弱缁夷的势力，所以《诗》始有“混夷駸矣”的记载。双方的敌对状况至武王时仍未发生变化，具体表现在武王的《牧誓》中所云“西土之人”，没有包括昆夷，证明后者没有与周人联盟，一道参与灭商的战争。

周人经过不断的努力，逐渐改变了同缁夷关系中的地位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。“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‘不可。……今自大毕、伯士之终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，天子曰：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无乃废先王之训，而王几顿乎？吾闻犬戎树敦，率旧德而守终纯固，其有以御我矣。’王遂征之，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”

《正义》引“贾逵曰：‘大毕，伯士，犬戎氏之二君也。白狼，白鹿，犬戎之职责也。’按：大毕、伯士终后，犬戎氏常以其职责来王。”上引文中之犬戎一词，是司马迁沿袭西周末春秋时的说法，实指缁夷。意思是说周穆王将伐畎夷，臣下谋父劝阻，以为畎夷自大毕、伯士二主以来，他们已向周臣服进贡，今坏先王之制出兵征伐，是不当的。但是穆王不听，将兵征伐，仅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，结果失信于戎狄，原来荒服的部族，不再向周朝进贡了。

大毕、伯士在位年代不可考，但必在周穆王以前，这是肯定的。从武王至穆王，中间相隔成王、康王、昭王，大概在康、昭王时缁夷已经不是周人的劲敌，成为周的“荒服”部族了。

穆王西征的结果，并未使缁夷彻底屈服，反而关系恶化，缁夷不断兴兵犯周。周宣王即位，令非子“以和西戎”^⑦；西戎中自然包括缁夷。和戎无效，又命秦仲“诛西戎”^⑧，秦仲之子庄公“伐西戎”^⑨，结果关系越来越恶化，最后于周幽王十一年（前771）“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，杀幽王（于）郿下。……周避犬戎难，东徙洛邑”^⑩。

从“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”一语可知，西戎是西方诸戎的统称，犬戎是西戎的一部分。西戎灭周时犬戎的力量最大，说明犬戎之中包括许多部落，缁夷即其一部。

经过这次战争，犬戎大批进入关中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：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，“遂取周之焦获，而居于泾、渭之间，侵暴中国”。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：“焦获亦名刳口，亦曰刳中，在雍州泾阳县城北十数里。周有焦获也。”唐代泾阳即今泾阳县，焦获在其北，犬戎占领焦获，就控制了泾、渭之会，实际上掌握了关中中心地区。周平王东迁以后，为了答谢秦襄公救难之功，不仅封其为侯，还说：“戎无道，侵我岐、丰之地，秦能逐之，即有其地。”^⑪这就是说，周室东迁以后，不仅渭河以北，